

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 历史逻辑与当代演绎*

刘红凇

内容提要：从18世纪至20世纪，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三次技术革命、三次工业革命；同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先后经历了三次政党转型发展，即从近代权贵党到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再到现代大众型政党，再到战后全方位党。其中的时空契合与内在关系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导致相应的产业革命、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技术革命是推动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的源动力与“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1世纪以来西方政党政治中频发的“黑天鹅”事件，正是技术革命驱动西方政党政治变革的当代演绎，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瓦解西方“卡特尔”化的政党政治，驱动新一轮政党转型发展。技术革命驱动西方政党转型发展的历史逻辑表明，科技水平直接影响与制约着政党组织结构与组织规模；信息技术直接制约着政党政治的透明度、公开性与开放性。然而，中外政党逻辑与政治逻辑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们党的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影响，绝非西方样式的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而是“打铁必须自身硬”与党的“自我革命”问题。

关键词：技术革命 政党变革 政党政治变革 政党转型发展 历史逻辑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政党政治正在悄然发生重大变革，其主要表现在于：一方面，以绿党、激进右翼政党和“民族地区主义政党”等为代表的新型政党“利基党”（Niche Parties）、网络政党等开始迅速发展，对传统政党政治造成较大政治冲击。其中，“利基党”超越了传统政党的阶级意识与意识形态分歧，主要依靠一些民众关注的非经济议题来吸引“中间选民”，故人们又称其为“议题党”^①。另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对民主政治发展带来新挑战，西方政党政治乱象频出。从2008年美国大选奥巴马逆袭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互联网总统”，到2012年5月法国大选中毫无执政经验的奥朗德胜出，2016年美国大选“政治门外汉”特朗普逆袭成功、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事件、2017年法国大选中“非左非右”的新政治派别“前进运动”领导人马克龙传奇胜出，再到2021年1月美国大选中拜登击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21年9月德国大选中“默克尔”党（联盟党）败选，等等，这些现象都超出了政党政治常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19ZDA008）的研究成果。

① 向文华：《西方利基政党类型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3期。

与常识,被人们称为“黑天鹅事件”。那么,导致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乱象频出的原因何在?尽管中外学者有不同解释,但都离不开当代科技革命因素。马克思把科学视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①,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本文力图从世界技术革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工业革命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来研究与发掘技术革命驱动政党政治变革的历史逻辑、基本规律与当代趋势。从技术革命驱动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角度看,近年来西方政党政治中频繁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当代技术革命引发西方政党政治变革的表现。

一、政党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分析视角与判断标准

从根本上看,政党是人们基于一定政治理念、根据一定政治原则组织起来,旨在通过执政或参政来实现其价值目标的政治组织。然而,世界上任何政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科技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政党发展过程中,既有一般性、渐进性的政党变化与党内改革,也有重大而剧烈的政党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20世纪初美国学者率先提出“政党变革”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党变革开始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常青话题^③。在此之前,“关于政党个体的变革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内,任何政党都只能属于国家与社会的一部分,人们研究政党政治的重点主要聚焦在政党体制上。

(一)“政党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政党变革

诚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人们对于政党变革难以拿出公认的可以度量的标准,故政党变革要比政党体制变革更难以界定^⑤。这导致在中外学者关于政党变革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往往将政党发展、政党变化、党内改革、政党变革、政党政治变革等概念相混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政党变革?

在国外,有美国学者认为,广义的政党变革是指在政党直接控制范围内、由政党组织或代表政党的合法个人发起,对政党组织与既有人力物力资源、代表谁、做什么等作出改动、修正与变化;狭义的政党变革则是指政党规则、结构、政策、战略和策略的变化^⑥。在国内,相关研究学者受西方学者关于政党变革三种分析范式(生命周期分析、系统分析与突变分析)的影响,有的认为政党变革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党功能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环境变化趋势的适应性反应、对突变性环境刺激抑或内在因素结合的反应^⑦;有的认为,无论是“政党改革”还是“政党自身变革”,实际上指的都是“政党根据时代要求对自身观念、纲领、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因此都可以用‘政党现代化’来概括”^⑧。也有学者试图对“政党变革”与“政党政治变革”作区分,认为“政党变革反映的是政党自身各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而政党政治变革反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第3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Harmel Robert and Janda Kenneth,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Issue. 6, No. 3, 1994, p. 259.

⑤ Peter Mair, “The Problem of Party System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No. 1, 1989, p. 254.

⑥ Harmel &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No. 6, 1994, p. 275.

⑦ 祝灵君:《政党发展与组织变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⑧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第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的是“由政党自身和政党体制变革所引起的有关政党政治的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①。

通过对中外学者关于“政党变革”相关定义的分析可见,关于政党个体的“政党变革”,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都主要聚焦在政党根据环境变化对政党诸要素的内在调整与发展变化上,明显具有“政党本位”或“政党中心主义”色彩。受立场、视角与视域影响,以政党为本位对个体化的政党变革的相关研究,明显存在三种倾向:一是聚焦在政党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造与“政党内部变革”上,主要是从政党意识形态、纲领与主张、组织原则、组织结构、活动方式、成员基础等政党自身构成要素变化来分析个体性的政党变化。二是关于政党变革的判断标准非常模糊,有意无意地混淆政党变化、政党发展、政党内部改革、政党变革、政党政治变革等相关概念。三是对政党变革的既有研究主要是以西方政党为参照,国内相关学者也基本沿用西方学者的分析范式、判断标准来分析政党变革。

(二)“国家-社会”视角下的政党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

从根本上看,政党存在的价值并非是为了“自我存在”,而是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或国家功能。无论学界是将现代政党视为“民主政治工具”“选举工具”,还是“利益代表”“阶级斗争”工具,是“社会公器”“国家公器”,还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纽带”,都是基于现代政党的公共价值而言的。从根本上看,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始终是政党政治的根本问题。因为若没有广大民众认同与支持,任何政党都难以赢得执政权;若失去了与国家政权的密切关联,政党就无异于一般社团组织。立足于现代政党的公共价值,可以得出关于政党与政党政治的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有无公共价值是判断古代“朋党”与现代政党的“试金石”。结党营私、以权谋私乃朋党的本质特点,亦是自古至今人们都视朋党为“恶”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政党公共价值的“大小多少”,是划分现代政党类型、判断政党“先进与落后”的一个根本标准。因此,只有从国家-社会视角,以国家与社会为本位,才能把握现代政党的公共价值,才能深刻把握政党转型发展的要义。

从国家-社会视角看,政党转型发展并非一般所言的政党内部改革与个体性的政党变化,而是指向政党政治变革背景下的政党转型发展,即面对政党-国家-社会关系重大变化,传统政党尤其是大党被迫进行党内重大变革与转型发展,以适应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变化,持续得到国家与社会认可,化解政党生存危机而赢得新生。进一步而言,政党转型发展既包括政党意识形态、组织形态、组织结构、成员构成等政党构成要素变化的“党内改革”,更包括政党地位与功能、政党体制与机制、政党活动方式与治理模式等政党政治要素的重大变化。

就西方政党而言,根据战后西方政党发展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指出:整个西方社会存在着一个从个人代表型的中产阶级政党到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大众型政党”,最后到争取尽可能多选民支持的“全方位政党”的发展过程^②。另外,以持续时间、社会政治的排斥程度、政治性相关资源的分布水平、政治斗争的主要目标、政党竞争的基础、选举竞争的样式、政党运作与政党竞选的性质、政党资源的主要来源、普通党员与政党精英间关系样式、党员特性等十项指标,西方有学者曾经对既有各种政党类型进行比较分析^③。从国家-社会视角看,西方政党从古代朋党到近代权贵党、现代大众型政党、战后全方位党等的转型发展,并非个体意义上的政党变革,

① 禹海霞:《政党变革、政党体制变革、政党政治变革含义辨析》,《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②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 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77—183.

③ Peter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7, pp. 110—111。

而是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的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在西方政党转型发展过程中,不仅政党自身构成要素发生了变化,政党政治基本构成要素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国家-社会视角看,根据对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研究,可得出研判政党转型发展的十项分析指标,即政党价值目标、政党地位与功能、政党领袖来源与特点、政党提名的内外方式、政党组织结构形态、政党封闭性与开放度、政党经费与资源、政党透明度与公开性、政党活动方式、政党治理模式。其中,政党价值目标是人们认识与判断政党转型发展的风向标;政党地位功能反映着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影响着政党观念,决定着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认同度;政党领袖来源与特点既反映着政党内部组织原则与党内关系,也反映着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政党政治发展阶段;政党提名公职候选人是现代政党的核心政治功能与显著标志,“如果一个政党不能从事提名活动,它就不再算是一个政党”^①;政党组织结构形态反映着政党组织化水平,政党组织化程度是判断政党类型的基本标准;政党封闭性与开放度,既反映着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与参与度,更反映着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党经费与资源乃政党生存发展之必需,其来源与构成影响政党的性质与地位;政党透明度与公开性事关民主政治发展水平,反映着民众有效地监督政党活动、防范政治腐败的可能性;政党活动方式既与政党价值目标有关,更与政党地位与政治环境相关;政党治理模式,既包括党内治理模式与方式,也包括国家治理政党的模式与方式,二者集中反映着政党政治基本关系。从根本上看,上述研判政党转型发展的十项分析指标,基本涵盖了政党政治的基本构成要素,这绝非政党自身构成要素所能涵盖的;上述十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基本上反映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与时代要求。

二、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

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要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西方政党转型发展的内因与外因是什么?政党转型发展是内因驱动,还是外因驱动的?是政党主动而为,还是被动而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从以政党为中心与从以国家-社会为中心的立场出发,其结论明显有所不同。

(一) 政党变革的内因、外因与视角反转

就目前研究情况看,以政党为中心来分析政党变革的内因与外因,自然会聚焦在政党自身变化与党内改革上,自然会把政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党内改革等因素视为政党变革的内因,把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科技革命等因素的变化视为政党变革的外因,得出诸如“政党内部矛盾变化导致政党变革”之结论。这正如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ilson)所言:“某种外部因素(尤其是竞争环境和影响环境的因素)为政党变革开辟了道路,但政党领导人是政党变革能否发生的关键干预性变量”^②。但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不到万不得已,西方政党领袖不会主动寻求党内改革,更不会主动推动政党政治变革。

反之,以国家-社会为中心来分析西方政党转型发展,必然会得出与“政党中心主义者”所言的“个体化的政党变革”明显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必然会把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科技革命等视为推动政党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政党政治发

① E. 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2, p. 64.

② 参见王勇兵:《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理论初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6期。

展的经验教训表明,个体化的政党变革与转型发展,都是被迫发生的;只有当政党面临生存发展危机时,政党自身才会寻求党内改革,实现转型发展。只有当政党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技术条件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才会引发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进一步而言,从政党作为国家或社会公器来看,某一政党的内部危机并不能代表所有政党都面临危机,更不能代表政党政治危机;只有当所有主流政党都面临既有功能衰退、国家与社会认同危机、生存与发展危机时,政党和政党政治才会被迫转型发展。从这一角度看,政党转型发展与政党政治变革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性变化,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是政党转型发展与政党政治变革的源动力。

(二) 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的历史轨迹

西方学者所言的“整个西方社会存在着一个从个人代表型的中产阶级政党到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大众型政党’,最后到争取尽可能多选民支持的‘全方位政党’的发展过程”^①之说,业已得到中外学者认同。但从政党政治基本知识看,其所言的“个人代表型的中产阶级政党”无疑是指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大众型政党”无疑是以无产阶级政党为原型。据上述判断,西方政党自产生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次政党转型发展,即从近代权贵党到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现代大众型政党,再到战后“全方位党”的发展过程。

从技术革命角度看,从16世纪中叶至今,人类社会共发生了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合计五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其中,两次是科学革命,即16—17世纪现代科学诞生,20世纪上半叶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三次是技术革命,即18—19世纪蒸汽机和机械革命,19—20世纪电力和运输革命,20世纪下半叶电子和信息革命^②。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三次技术革命不仅直接催生了三次产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与社会形态;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同时,驱动了西方世界三次政党转型发展。

第一次技术革命即蒸汽机与机械革命,发生在18—19世纪,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第一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化时代,同时使英国成为头号世界强国。恩格斯指出:“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③。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看,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步确立了代议制民主政体;1679年英国议会在围绕詹姆士王位继承问题的争论中形成了“托利党”与“辉格党”,学界称之为“权贵党”,并视之为近现代政党与政党政治的开端。在英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1832年英国“选举法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不仅使得资产阶级选举权得到有限扩大;而且,使英国两大政党开始自上而下建立松散的中央与地方组织体系,开始实现从近代“权贵党”向组织化的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转型发展。在这次改革之后,1832年英国“托利党”正式更名为“保守党”,1834年“辉格党”正式更名为“自由党”,并延续至今。从根本上看,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英国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在此意义上看,英国政党从近代“权贵党”向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转型发展,是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历史“产儿”,是英国资产阶级选举权扩大到一定程度后进行较大规模的政党竞争的历史产物。

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以欧美电力和运输革命为标志,其直

①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 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77—183.

② 白春礼:《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与启示》,《科技导报》,2021年第39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接后果是导致第二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从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科学、技术、生产开始密切结合。技术革命在推动形成世界市场与资产阶级大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为现代大众型政党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同时,交通运输革命极大促进了人际交往与思想观念变革,为现代大众型政党的产生提供了交通工具与交往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同资产阶级的抗争中,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型政党”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③,如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879年法国工人党正式成立。在这一历史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英美等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也开始提高其组织化水平,实现向现代大众型政党的转型,并开始形成英美“两党制”。其中,英国1867年“人民代表法”与1868年大选,开始确立“议会多数党组阁”政治原则,标志着英国“两党制”正式形成;美国在南北战争(1861—1865)之后,在19世纪80—90年代形成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长期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美国政党发展进入了近代两党制时期”^④。

第三次技术革命,即20世纪下半叶开启的电子和信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不仅推动形成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也直接推动人类社会迈入自动化、信息化时代。“如果从物质、能量和信息这三个维度来描述人类现代化进程,信息化无疑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变化最重要的驱动力”^⑤。从世界发展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开始形成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格局;然而,在每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建设与生产力发展都得到凸显。在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开始从以阶级抗争为主要目标的“大众型政党”,向以选举为中心的“全方位党”转型发展,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庞大的政党综合体系是过去阶级界线较为分明、派系结构较为突出的时代产物,现在它正向范围广泛的‘人民’的政党转变”^⑥。相较大众型政党而言,“全方位党”具有政党意识形态开始减弱、政党间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政党内部领导集团地位强化、党员作用弱化,政党降低阶级身份重要性,转而谋求更广泛的选民支持,政党减少对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倚重,力图保持与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等显著特点^⑦。从战后西方政党政治看,在英国,率先实现向“全方位党”转变的保守党不仅在1951年大选中击败了执政的工党,而且创造了从1979—1997年连续执政4届、长达18年的“辉煌”。比较而言,英国工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变要滞后于保守党;面对连续败选的政治局面,英国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全方位党”转变,直至推行“布莱尔主义”,取得了1997—2010年连续四届执政,执政时间长达13年的“辉煌”。在德国,战后成立的具有“全民党”色彩的基民盟与基社盟结为姊妹党,从1949年至1969年连续执政20年,从1982年到1998年连续执政16年;面对连续败选局面,德国社会党开始寻求改革,实现从“工人党派”向“人民党派”的转变,并于2002年9月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在欧盟,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全方位党”转型发展,在20世纪90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6页,第401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Jonathan A. Rodden. *The Long Shadow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eft*, March 25, 2011.

④ 张滋暑:《美国两党制发展史》,第2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⑤ 达雷尔·M. 韦斯特:《下一次浪潮:信息通讯技术驱动的社会与政治创新》,序言,第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

⑥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 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77—183.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欧盟(当时15国)13国左翼政党同时执政的“盛况”。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社会党先后向“全方位党”转型,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也开始从所谓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1961年苏共22大更是提出用所谓的“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宣称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三) 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

通过对三次技术革命、三次工业革命、西方政党三次转型历史脉络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数字巧合与时空契合,在技术革命与政党转型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即每一次政党转型与政党政治变革背后都有科技革命的影子;哪个国度、哪个区域先发生技术革命,就会率先引发相应的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比如在第一次技术革命时空下,英国率先实现了从近代“权贵党”向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转型。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时空下,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型政党形成,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也在向现代大众型政党转化。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时空下,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党先后实现了从现代大众型政党向战后“全方位党”的转型。

进一步讲,三次技术革命与三次政党转型之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或延时性,总是先有技术革命,后有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然后才有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而且,技术革命对政党转型的影响不是匀速的,而是逐渐呈加速之势。比如,若以1790年瓦特发明工业蒸汽机为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显著标志,那么,在40年后(1832年)英国实现了从近代“权贵党”向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转型;若以1866年西门子发明发电机为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显著标志,那么,在3年之后,现代大众型政党的典型代表就正式出现,即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诞生的社会主义性质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8月正式成立。这其中的原因,既取决于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技术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含量。从历史上看,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实现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从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生产领域、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科技革命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越来越直接。战后西方学者熊彼特(Schumpeter)也承认:唯有通过技术创新,方能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和创造新的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突变”,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改变人们生存的时空状态与社会组织的时空范式^①。这一论断与理论逻辑,也深刻揭示了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政党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的当代演绎

客观而言,任何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都有一个发展与深化过程;任何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都不是学科层次或科技史层次的科技革命所能涵盖的,只有那些既能改变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又能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人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科技大革命”,才能称得上划时代的科技革命。根据科技界的相关定义,科技革命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发生在学科内部的学科层次的“科技小革命”,这类科技革命数量众多,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影响学科自身发展上;二是发生在整个科技领域,影响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重大转变的科技史层次的“科技中革命”;三是人类文明史层次的“科技大革命”,其不仅属于世界科技史层次的“科技中革命”,也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着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②。正是根据此标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序言,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② 参见何传启:《新科技革命的预测和解析》,《科学与现代化》,2018年第1期。

准,才有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二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之说。

(一) 信息技术发展与近 20 年西方政党政治危机

从科技大革命角度看,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既具有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的双重特点,也具有“承前启后”之意。其前期可归属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范畴,主要彰显的是其技术特征;而后期则充分彰显了其信息特征,“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与广泛运用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成为传统政党政治的“离散剂”与当代政党转型的“催化剂”。

具体就信息技术发展历程而言,科技界基本公认,从 1983 年国际互联网建立至今,信息技术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通常所言的“Web 1.0 时代”(1983—2001 年)、“Web 2.0 时代”(2001—2008 年)、“Web 3.0 时代”(2008—2014 年),以及正在到来的网络空间时代(2015 年至今)^①。其中,在“Web 1.0 时代”,信息技术对政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立静态政党门户网站,进行网站政治宣传上,如 1995 年美国民主党建立政党网站,1996 年克林顿建立了个人竞选网站。在“Web 2.0 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开始运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工具进行竞选宣传、政治动员、筹集经费。在 2008 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以信息网络作为主战场传奇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互联网总统”,成为历史上信息技术发展影响政党政治的标志性事件。

前文已言,二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党等都存在从以阶级抗争、意识形态色彩鲜明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型发展的过程;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10 年这 20 年间,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原苏东地区的共产主义政党,都在经历较长时期执政后遭遇执政危机乃至执政失败。比如,1989—1991 年间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96 年连续执政多年的印度国大党在大选中失败,2000 年连续执政 71 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落败。在战后西方世界,在德国,执政时间合计长达 36 年的基民盟与基社盟在 1998 年大选中落败。在英国,保守党从 1979—1997 年连续 4 次执政、执政时间长达 18 年后,在 1997 年大选中落败;英国工党向“全方位党”转型成功后,曾经在 1997—2010 年间连续四届执政长达 13 年,但在 2010 年 5 月大选中败北。在欧盟,进入 21 世纪后,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13 国左翼政党同时执政的“盛况”一去不返。在学界,有人将上述现象称为 20 世纪末的西方政党政治危机。

从一定意义上看,战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党赢得大选胜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从现代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型的成功;但 20 世纪末的世界政党政治危机并非是从现代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型所致,而是由于政党长期执政而导致的政党僵化、精英化、国家化、官僚化乃至腐败化(或曰“卡特尔”化)所致。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有西方学者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政党政治世界形成了一种新型政党即“卡特尔党”^②;并且认为“卡特尔党”是政治资源分散、大众普选的产物,具有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政党精英以职业政治为目标、政党竞争以管理技能和效能为基础、政党运作以资本密集型运作为特点、大党交替执政格局固化、政党因成为“国家代理人”而国家化、政党社会功能弱化等显著特点^③。从战后世界政党政治发

① 参见刘红凇:《信息网络化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

② Peter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7, pp. 110—111.

③ R. S. Katz and P.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995, 1, pp. 17—21.

展看,“卡特党”并非是“全方位党”的转型发展,也难以成为一种积极的新的政党类型,而是战后“全方位党”的极端化发展或“异化”现象,即因政党较长时间执政而导致的“全方位党”精英化、国家化、官僚化现象。在此意义上看,战后德国基民盟与基社盟从1949—1969年连续执政20年,因长期执政导致其国家化、精英化、官僚化,进而失去民心,导致执政失败。也许正是基于德国基民盟与基社盟的这种现象,才有“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形成了‘卡特党’”^①之说。

(二)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初现端倪

在21世纪初,美国民主党前主席安德烈曾经指出:“谁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网络,与民众进行沟通,谁将主导未来”^②。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到了“Web 3.0时代”以后(即2008年以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众多领域都孕育着重大突破,以“互联网+”“智能+”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初现端倪。这正如有学者所言:“真正的突破出现在2009—2010年前后,硬件设备的进步使新一代计算机在运算速度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得到大幅提升。”^③也正如白春礼院士所言: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方向,很有可能得益于第五次科技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但新一轮科技革命不再以单一技术为主导,而是呈现多点、群发性突破的态势^④。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以“互联网+”“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在驱动经济社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生存”开始从“时髦话题”变为现实;同时,也正在加剧对传统政党政治的瓦解,驱动当代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一方面,“互联网+”“智能+”等急剧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权力结构,急剧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与行为方式,使得政治公开透明与大众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网络民主、大众直接民主、网络政党等新生政治现象对传统间接民主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魅力-权威型政治领袖”乃至“民族主义”受到大众追捧。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开始成为西方政治选举的“主战场”。这使得以选举为中心的西方“全方位党”趋于“空心化”,政党的组织功能进一步弱化,同时,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政治选举的个人化、媒体化。上述两方面交织作用,使得西方传统的政党政治法则开始“失灵”,精英化、国家化、官僚化、“卡特党”化的政党再也难以为继;使得西方世界面临着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再造与政党政治重塑,迫使主流政党走向信息化、开放化、民主化。

对照政党转型与政党政治变革的基本分析标准可以发现,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已经初现端倪,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政党组织功能弱化、政党资源网络化、政党组织“空心化”。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了“媒介民主”快速发展,在当代西方政治选举中,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政党扩充资源、筹集政党经费、政党竞选的主阵地,政党组织固有的代表民意、政治动员、政治宣传、政治筹款等传统政治功能不断弱化;而政党候选人的“智囊团队”与“专业选举团队”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显著。这使得政党组织的固有功能不断弱化,并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政党的“空心化”。第二,政党政治透明化、政党提名开放化、政党领袖个性化。以前,西方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提名与党内领袖选举都属于“封闭式”选举,只有注册党员才能参加。然而,随着网络民主与大众直接政治参与的发展,西方国家政党提名与党内领袖选举被迫从“封

① Peter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7, pp. 110—111.

② Costas Panagopoulos, “Part-e Politics: Investigating the Online Presence of Majo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paigns & Elections*, September 2003, p. 32.

③ 封帅、鲁传颖:《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治理》,《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2018年第10期。

④ 白春礼:《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与启示》,《科技导报》,2021年第39期。

闭”走向透明与开放。如在英国,工党领袖选举从1981年至2014年实行“选举人团制”(议会党团、党员、支持者各占1/3比重),但从2014年开始实行“注册支持者制度”与“一人一票制”^①。这种“开放式初选”必然弱化政党领袖对党组织成员的依赖,而强化对社会大众的依赖;同时,也会强化政党领袖在党内的个人权威。第三,西方政党治理模式进一步法治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国家一般视政党为社会组织或政治组织,实行政党内部自治;二战后,“政党入宪”开始成为西方政党政治的基本趋势,相关国家开始用法律来积极承认政党,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对政党活动规定原则性条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党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加强国家立法,旨在用国家法律来强化对政党选举行为与政党经费的规制。即使世界上一贯对政党采取“默认”态度的英国,也于2000年出台了“政党、选举及全民公投法”,开始用国家法律严格规范政党注册、政治捐款、竞选开支与选举运动等公共选举行为,实现了英国政党治理模式从“政党自治”到“法律择要规范”的当代变迁^②。

四、政党政治变革和政党转型发展比较分析

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三次技术革命、西方政党三次转型发展的全景勾勒与比较分析,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改进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引发相应的产业革命,也都会引发相应的社会变革、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从根本上看,是技术革命推动产业革命、社会革命、上层建筑变革、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技术革命才是推动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的源动力与“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一判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科技观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强调科技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④。就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言,恩格斯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⑤、“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科技观结合起来看,把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带入”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的历史时空,可得出如下基本逻辑,即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经济基础变革→社会变革→上层建筑变革→政党政治变革→政党转型;而且,这一逻辑关系具有不可逆转性,前者与后者之间都是“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正如列宁所言:“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⑦当然,这里所言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制约与被制约关系、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条件与结果等因果关系^⑧。通过对技术革命与政党政治变革、政党转型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全面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认识:

① 王薇:《英国工党领袖选举危机折射西方政党制度性困境》,《当代世界》,2016年第9期。

② 刘红凇:《英国政党治理模式变迁:从政党自治到法律择要规范》,《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页,1995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 《列宁全集》,第1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⑧ 黄光秋:《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比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其一,技术水平直接制约着政党组织结构与组织规模。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人类社会的交通方式、活动方式与交往方式;只有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交通交往比较便捷之时,才会产生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现代政党。从历史上看,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与蒸汽火车发明使用以后,才打破了人们活动与交往空间的封闭性或狭隘性,使得资产阶级有限选举从中央向地方延展,使得活动于庙堂之上的近代“权贵党”到地方去建立基层组织,实现向组织化的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转型。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欧美电力和运输革命)以后,广大民众的交通交往方式才得以根本改变,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阶级斗争才得以开展,才能产生组织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覆盖全国、自下而上组织健全的现代大众型政党;若没有便捷的邮政网络与交通条件,现代大众型政党难以产生,即便产生了也难以有效开展活动。只有到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后,大规模的普选、投票、计票才能有效进行。只有进入21世纪信息化高度发达以后,大规模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捐款、网络政党等政治活动才能出现。

其二,信息技术直接制约着政党政治的透明度、公开性与开放性,也直接影响着政党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宣传、政治交流的能力、方法与水平。在20世纪初,广播电视发明使用以前,政治传播只能依靠纸质媒介与密集人力资源,西方政党只能主要依靠组织成员来散发印刷品,进行政治动员与政治传播;而且,在纸媒阶段,政治信息具有封闭性、传播速度较慢等特点,这客观上有利于“密室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视发明使用以后,人类社会才真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实现,西方国家才能真正进入大众普选时代。然而,广播电视等传媒虽然促进了大众传播,但仍具有自上而下单向传播、易于政治操控、延时性等短板。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优势,有利于信息资源的公开化、大众化与全天候;只有到了“Web 3.0时代”(2008—2014)以后,才能真正实现政治公开透明,才能为广大民众直接政治参与提供便捷手段,充分调动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才能真正有效实现网络舆论监督。

其三,纵观历次技术革命与西方政党政治变革,可得出一些基本认识:在政党价值目标方面,是代表权贵阶层之利、有产阶层之利、劳动大众之利,还是兼容并蓄,这始终是判断政党价值目标的基本标尺;对“私利与公利”“精英利益与大众利益”的不同追求,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政党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追求。一个政党只有不断突破自身利益局限,尽可能地代表广大民众之利与整体之利,才能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在政党与民众关系方面,如何正确处理政党领袖、政治精英、社会大众(包括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这始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问题;是依靠政治精英还是广大民众,这是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个“两难选择”问题;摇摆于二者之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则反映了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势。从根本上看,民心向背决定执政成败与政党兴衰,只有密切联系民众,赢得民心,政党才能赢得执政权;反之,僵化保守、精英化、官僚化、脱离群众的政党,必然会遭遇政治危机、甚至走向衰败。

其四,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西方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但当今时代依然处于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依然是一个国家难以取代的政治权力中心。如何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来科学有效地规范政党政治行为,既能有效防止权力滥用与政治腐败,又能保持政党政治的创造性与政党活力?如何克服“塔西佗陷阱”,改善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重构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如何正确处理政党政治行为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与克服政局与社会动荡不安?如何正确处理政党开放化、空心化、网络化与政党组织稳定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规范大众网络政治参与,防止与克服网络政治言论“非理性”“污名化”与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等等,都是当前西方政党政治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无国界,技术革命对世界政党政治的影响既具有一定共性和大致相同的作用机制,也具有明显差异。面对当代科技革命与政党政治变革,各国政党都面临着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再造、政党重塑与政党发展问题,唯有“未雨绸缪”、顺势而为才是有效应对之举。在中国,尽管中外国情与党情不同,政党体制与政治体制不同,但科技革命对我们党的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从2008年开始兴起的网络舆论监督与干部“本领恐慌”可见一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①从根本上看,由于中外政党逻辑与政治逻辑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们党的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影响,绝不是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而是“打铁必须自身硬”与党的自我革命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开拓创新、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既要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开展党建工作,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断提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创造性、效率与质量,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更要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增强改革创新本领,有效运用新技术来推进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我们既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②;也要牢固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有效预防与克服各种政治风险,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人类科技革命、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格局变迁的发展规律深刻表明,从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电力和运输革命,到电子技术和自动化,再到当代信息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在这一技术变革过程中,哪一个国家能够引领科技革命,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哪一个国家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根本上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有新的挑战,又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唯有锐意进取,改革创新,才能“乘”新一轮科技革命之“势”,有效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功业!

作者:刘红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200433)。

(责任编辑:林立公)

① 《习近平纵论互联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2月16日。

② 习近平:《推动信息化更好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23日。